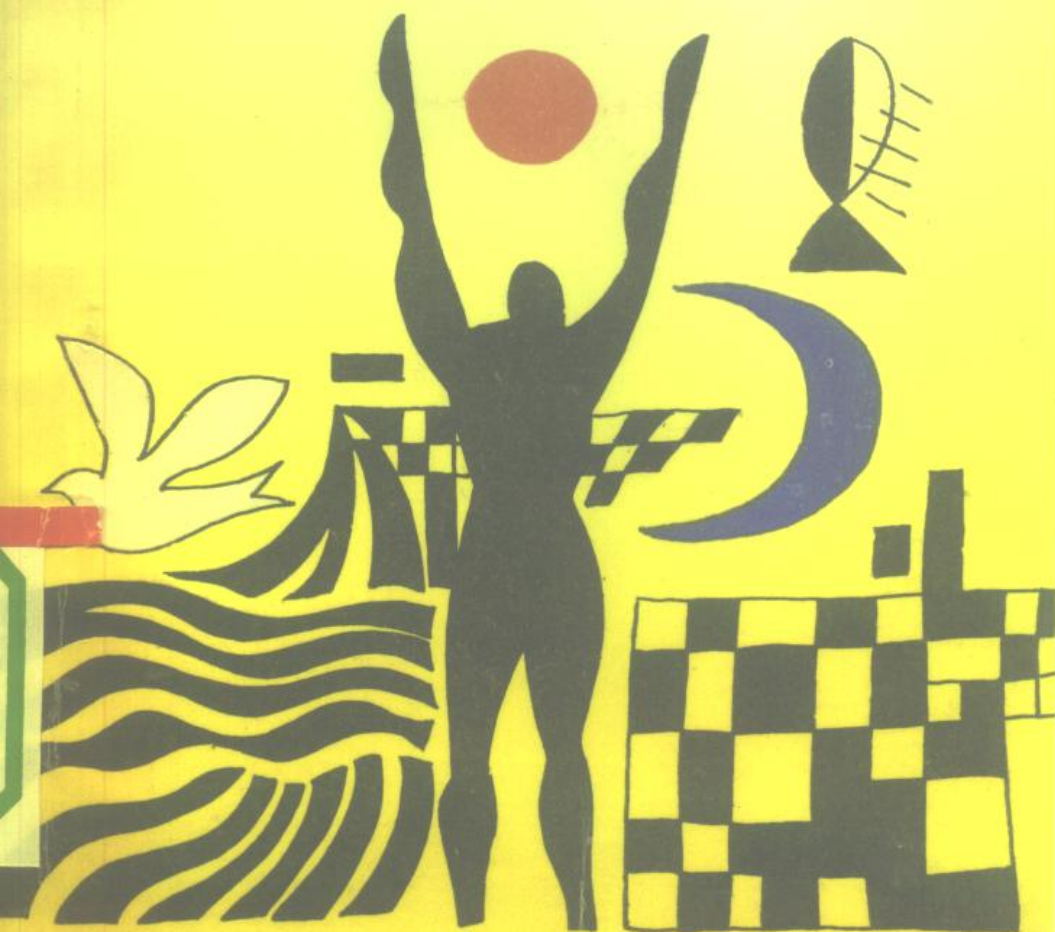


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著

曹中德等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

(美)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著

曹 中 德 等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9号

G7F02/19

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著
曹中德 等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沧州沧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4.5印张 308千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 600册

ISBN 7-80563-450-5/B·016

定价: 16.80元

此中译本之出版系获得原出版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许可；并按后者要求，印出原版本上的版权页：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Inkeles, Alex, 1920—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

Bibliography: P.

Includes index.

1. Underdeveloped areas—Social conditions.
2. Civilization, Modern—1950— 3. Sociology—
Methodology. 4. Social surveys. I. Title.

HN980.1545 1983 303.4/4 82—19758

ISBN 0-231-0544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Guildford. Surrey

Copyright © 198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译校人员名单

译者：曹中德 柯文礼 宋德利

郭惠远 黄铁梁

校者：胡天民 曹中德 李运兴

编者的话

《个人现代性探索》^①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阿·英克尔斯在世界许多地区进行了十多年研究之后的学术结晶。这部书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力量如何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无论这些人是丈夫还是父亲，是种族社区的成员还是新兴国家的公民。本书从人际关系出发，探讨现代化的含义，并且说明现代化制度机构对个人精神调适的影响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

此外，本书还别具一格地将研究个人现代性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英克尔斯等人着眼于未来，着重阐述个人现代性的内在含义，以便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

《个人现代性探索》一书完整地勾画了“现代人”的轮廓。英克尔斯和大卫·史密斯在其合著的《迈向现代化》一书中，也就是在汇报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关于社会及文化现代化科研计划调查结果的第一部著作中，对此也曾有过论述。早先发表的那部著作提出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在本书中都得到清晰的验证和补充。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出版过《苏维埃俄国

^①直译名。所谓“个人现代性”，即“人的现代化素质”。考虑到我国习惯用法，征得译者同意，书名改为《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文中则仍沿用原表达法——“个人现代性”及《个人现代性探索》。

的社会变迁》、《社会学是什么?》《迈向现代化》(或《成为现代人》)等六部著作。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协会会员,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一年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一九八二年,因在社会心理学方面贡献卓越,获库利-米德奖。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①写道:“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及其助手近二十年来从事一项全面的研究计划,调查属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个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什么共同的因素。尽管政治及文化背景不同,是否存在着渊源于纯现代性因素的人的共同品质、共同特点和共同人格呢?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英克尔斯在本书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着眼于个人的变化,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倘若如英克尔斯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正朝着全球性的社会发展,那么这些调查结果和论点便是对各种现存的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另外,此书读起来引人入胜,因为它探讨了什么是‘现代性’这个令人神往的问题。”

盖伊·E·斯旺森(Guy E·Swanson)写道:

“英克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个人现代性的本质、渊源及后果的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少有的最重要的调查报告之一。任何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如果想解释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此书文笔清晰流畅、通俗易懂,不失为又一吸引读者的优点。”

①丹尼尔·贝尔是哈佛大学教授,1973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因首先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而著名。他的近作《信息社会的社会结构》,摘要发表在我国《现代化》杂志1984年第3期。——译者

中译本序言

每个作者在获悉他的著作被译成另一种文字，将获得新的更多的读者时，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就我的情况而言，在得知“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即将在中国同读者见面时，甚感欣慰，但有其十分特殊的个人原因。

1983年我首次访华，是去给首批从各地选拔来的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讲课。在此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近三十年没有开设系统的社会学课程。南开大学负责人邀请我给这批学生讲授“现代化社会学”（即“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那时候“四个现代化”纲领已广泛提了出来，但是现代化的真正涵义还未被许多参加实现这一纲领的人和准备研究这个题目的学生所充分了解。通过课堂交流，学生们教给了我许多有关中国及其政府体制、社会组织知识。从我方面来讲，我想也不能算是不谦虚，我在南开大学的讲课，以及随后在天津等十几个城市的许多讲演和座谈，在相当程度上使我的中国听众对现代化内涵，特别是对我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第五个现代化”在此指的是人的现代化，人是最重要的资本，通称“人力资本”。但是当时能听我讲演的人数毕竟有限。而现在由于此书出版，我想我关于现代化的思想，会为更多的读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所了解。

此书出版令我特别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同那位已成为我最好的中国朋友的人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曹中德教授的紧密合作关系。我去南开大学之前，曹教授曾讲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但是他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促使他争取到学

校的许可来听我关于现代化的课程。他非常专心地读了我的著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同我讨论我在讲课和书中提出的各种思想。我逐渐感到，曹中德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所有人中间对那些思想产生最强烈共鸣的人，对我所阐述的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理解最佳的人。

曹中德教授后来完全改变自己原来的专业，并成为南开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系主任。他在中国采用了测量个人现代性的问卷，而本书恰好是论述个人现代性量表的编制和运用的。虽然当时他工作繁忙还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但他主持并完成了调研设计工作，在天津各类工厂、个体户、乡镇企业和农民中间收集了近 1115 名男女普通劳动者（19-35 岁）问卷的答案。调查结果尚未发表，但资料分析足以使我们对一些重要发现作个总结，在撰写“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一书中译本序言之际，发表这个初步总结看来颇为适宜。我们不能忘记，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教授、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竞能教授曾给予巨大支持和帮助。

首先应指出，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的抽样中，决定一个人成为现代人的那些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综合特征之形成，同我们早先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调查情况基本相同。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那些效能感较强、工作和生活中计划性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守时惜时、重视子女教育、同妻子交流思想、赞成计划生育的人，都是较现代化的人。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个人现代性综合量表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内容和结构，而其技术“信度”根据克隆巴奇的阿尔法方法统计，约为 .80。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曾

经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会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产生一种不同的、只该国所特有的态度和价值观结构。而现在，中国的现代人显然具有和其他国家现代人同样的特征。

第二，这些资料表明，至少在中国，决定男人成为现代人的那些态度和价值观，大致同样也决定女人成为现代人。这个发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因为早先我们在六个发展中国家工作时，无法对居民中的女性进行研究。然而在中国我们能这么做。资料分析说明，决定妇女成为现代人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综合特征，实际上同决定男人成为现代人的综合特征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能够为中国设计一种能够测量男女两性的量表，这种量表具有同样的内容，并且取得了测量男女两性的同等信度。

第三，也许是最有趣的一点，在某些方面我们发现，一些因素本来在其他地方预示着男女是否成为现代人，但它们却不能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样本中发挥同样作用。接触大众媒介，特别接触广播，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都会促进男人和女人现代化。然而，在中国，教育对现代性的影响，却提出了一个同我们曾作过调查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截然不同的模式。在那些国家，上学时间愈多，人就愈现代化。的确，教育在任何地方都是促使人现代化的一种最重要的生活经验。但是，与此相反，在我们的中国样本中，教育程度同现代性量表上所得分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受教育愈多，他或她根据我们量表的测量就会愈缺少现代化！我们觉得，为了解释这种奇特的结果，最好从中国近期历史的一些事实出发，了解这些事实如何反映到我们特殊样本呈现的生活经验上来。在此，我们应当牢记，我们调查的范围，只是工农商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和劳动者。我们没有调查白领

工作人员，如办公室人员、半专业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干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中间，中国有一个情况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即有一些高于平均教育水平的人（如上了14年至19年学，包括进修时间），在工厂或农场当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当半专业或专业工作者。不难发现，这些人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安排感到沮丧，会觉得读书无用，技能未得到应有的酬报，觉得命运或运气比勤奋更能决定人的处境，于是使他们产生许多其他看法，以致他们在现代性量表的核心问题，诸如计划性、效能感等类问题上获低分。

但是有一部分人所受的教育与他们工作的性质吻合，无沮丧可言，那他们又是何种情况呢？我们发现，在其他文化水平上，比如上了1-10年学，受教育年限在中国仍不能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是个人现代性的可靠指标。我们认为，这一情况也许反映了中国大跃进年代以至文革十年的坎坷经历。整整那个时期，学校生活常常被政治运动所中断，教师往往由于阶级出身受到迫害，传统学科遭到蔑视，被政治灌输所替代。在这种条件下，教育很难起到它在较为正常条件下所发挥的培育身心和情操的作用。我们样本中的大部分人曾生活在动乱的年代，他们那时候果真上过学，或是只是争取上学，所以并不奇怪，他们名义上的上学年数看来对于促使他们成为现代人并未发生多大作用。

而工厂对人的影响又怎么样呢？在我们调查过的所有其他国家，一个产业工人在工厂工作愈久，工厂对他持续产生的良性影响就会使他愈现代化。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我们未发现这种影响。本来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个人的职业预示着他或她在现代性量表上所占的地位，但是城市

产业工人并未成为最现代化的人，而是农村人在现代性量表上赢得了最高分。这同我们调查过的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全然不同。

尽管农业劳动者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现代化，但也出现了一种情况：在农村劳动者中间，获得最高分的是那些生活在农村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在实行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而普遍。从上述事实也可窥见工厂经验对人的影响，虽然不很显著。看来，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工人活动的相同之处，是他们具有一个更能鼓励自力更生、创新、勤奋、充分计划性、经心安排时间的环境。中国改革始于农村。鼓劲发挥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的一系列政策首先在农村实行。在中国农村，生产第一线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现代化过程早于许多城市工厂。

在我们的抽样中，城市产业工人实际上来自国营企业。不难看出，那里的工作环境并不十分鼓励主动性、乐于接受新经验、创新、守时惜时以及其他促使工人在我们量表上获得现代化分数的其他素质。中国一些国营企业的工人显得比较保守和传统，还未成为进步的潜在带头人，如其他国家产业工人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发现确实应催促人们加紧推行中国业已开始的工作：面向新的模式，转换国营大中企业机制，使之较少依靠国家预算，更多依赖市场，鼓励企业在生产、人事、财会和市场政策上采取更为创新和进步的措施。

本世纪行将结束，中国又一次处于伟大变革的过程中，她正向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成分，以便为全体中国人民创造更富裕美好的生活。为达到这个目标只靠技术手段是不够的。也不能只靠经济改革来取得。其他制度也应改革。不能忽视，应实行一些变革，使初

具现代化雏形的人们的能量进一步发挥出来。而对于后进者来说，则应该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加快他们在个人现代性道路上的步伐。我希望，本书所述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有些益处，因为中国正在筹划迈向全面现代化的新长征。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
1994年6月23日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导 论	
第一章 对个人现代性的认识和误解	2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现代人的模型	41
第三章 产生个人现代性的力量：一种效应理论	67
第二部分	
第四章 现代性量表的建立与实施	89
第五章 第一阶段的结果：总结	118
第三部分	
第六章 跨文化角度的印度人现代性形象	148
第七章 不同各族和宗教群体中的个人现代性 ...	155
第八章 个人现代性的民族差异	191
第四部分	
第九章 跨国家现代主义量表的构成与实施 ...	219
第十章 现代性与对家庭规模限制的接受	241
第五部分	
第十一章 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公民性	261
第十二章 个人调适与现代化	297
第十三章 现代化、现代性与老龄化	321
第六部分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中人的现代化	336
第十五章 个人现代性的前景	349

导 论

第一章 对个人现代性的认识和误解^①

在关于近数百年来人类生活重大变迁的简明清单上应该填写些什么，人们是可以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的。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填写民族国家的崛起及其鼎盛时代、工业大发展、农业机械化、科学突起、科层制蔓延、教育普及、城市发展等等。虽然我们对表上的个别项目可以取得一致看法，但要对所有这些变迁做一个总的表述，便会遇到种种困难。而对这些现象提出的每种解释，都会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确给予了我们极其重要的启迪，激励我们注意研究生产方式和总的阶级关系。而韦伯使许多人相信，存在于宗教和其它先验的世界观中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首先对经济行为产生很大的冲击力。索罗金的断言也不尽错，他说：我们目击一个观念化的超文化系统被一个感性型的系统所替代。尽管人们对这些观念争论不休，这些堂皇的理论面临的种种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而且这些理论所论述的种种倾向已经深化和有了加速的发展。

在探讨世界性变迁过程时，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曾面临一系列明显的选择。一种选择是采用作为我们部分遗产的某一宏伟公式，把它运用于新出现的现象。另一种选择是同前人竞争，设计和传播包罗万象的新系统，如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我们认为两种方法都不适宜。过去的宏伟

^①根据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对个人现代性的认识和误解》一文改写而成，选自A·科瑟和奥托·N·拉森主编的《社会学争论的益处》（纽约：自由出版社，1976），103-130页。

公式酷似现实的或潜在的正统，而在一个致力于使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人们都回避正统。另外，批判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经典模型和新的普遍体系所采用的论点，不管是含蓄的还是直率的都有其局限性。

六十年代国外流行一种较为折衷的新思潮，意识形态倾向较弱，而边缘学科的性质较强。当时经济学家领先，在研究所谓的发展或增长率方面起了榜样作用。他们着重采用因子分析法，力图确定所谓“发达”国家的一般社会经济特征，并找出导致经济增长的共同道路，如果真有这种道路的话。政治学家着重研究国家的发展。人类学家把这个过程视作一种文化潜移和社区发展的过程。人口学家研究人口。心理学家则描述个性特征，认为那是形成创业行为的关键，或者测量处于迅速变化之中的个人的精神调节。¹

当然，每种学科只研究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巨大社会变迁过程的某一方面。在五十年代大约十年期间，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起着主要作用，他们的基本观念“经济发展”成为总的议题，问题的其他方面都归纳到这一议题之下。但是，当其他学科转而注意这些问题并详细研究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时，显然就十分需要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术语，以便更贴切地反映所研究的制度的广大范围和不同学科展示的前景。在整个六十年代期间，“现代化”这一术语不断流传，得到广泛承认，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共同关心的这一过程的总称。² 于是通常就把社会和各种制度描绘成为具有不同的现代化程度，而“现代”制度和“传统”制度的两极性及其组成成分也被刻画出来。³

现代化的总体研究是围绕一系列分散的分析点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涉及各种制度。研究人员探讨比较发达国家